



ZHONGGUO JINXIANDAISHI
zhuanti lungao

中国近现代史 专题论稿

赵振国 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史

专题论稿

赵振国 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论稿 / 赵振国著. — 大连 :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611-6119-7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②中国历史:现代史—研究 IV. ①K250.7②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7971 号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大连市软件园路 80 号 邮政编码:116023

发行:0411-84708842 邮购:0411-84703636 传真:0411-84701466

E-mail: dulp@dulp.cn URL: <http://www.dulp.cn>

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170mm×228mm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张:10.75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汪会武

责任校对:齐雪帆

封面设计:波 朗

ISBN 978-7-5611-6119-7

定 价:20.00 元

目 录

从“大陆一直不宣传国民党抗战”这一伪命题说起	1
曾国藩及其历史评价	7
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	34
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演变与当代思考	46
中央《九月来信》与中国革命新道路	59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74
关向应——辽东半岛人民的骄傲	84
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历史意义	93
从《浪淘沙·北戴河》看诗人毛泽东	103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认识分歧的探析	112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几点理论思考	123
林彪其人及“九一三事件”	131
后 记	168

从“大陆一直不宣传国民党抗战”这一伪命题说起

（代序）

对于同一个历史命题，人们往往有着不同的看法。这是由于论者思考问题时的角度不同，对历史资料拥有和掌握的程度不同，用于分析问题的标准不同，甚至有的人对研究和议论对象直觉的亲疏、好恶情绪，也影响其看待某些问题的立场。因此，许多结论也很难趋同。这一问题应当怎么认识呢？先举一个例子。

近些年，在坊间和网络上一一直盛传“多少年来，共产党一直不宣传、不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的说法，有的人张口就说“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书，教材里从来就没有看到有关国民党抗战的内容”。如果说，这些人是在改革大潮兴起之前接受的中高等教育，姑且情有可原，因为那时“极左”思潮长期影响了我们对国家各项工作的认识，再加上当时海峡两岸长期对立，使国共两党彼此都不能客观认识在过去较量了几十年的政治对手。这是历史造成的局限。

但是，如果说以上这些话者的年龄在45岁以下，恐怕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学者提出“中国革命是由近代中国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政党共同推进，最终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观点后，教育部规定各大学从1985年起普遍开设《中国革命史》这门公共必修课，授课时数为48节课，每名大学生都要修完课程，且考试及格后方可毕业。当时《中国革命史》教材所涉及国民党军队对日抗战的内容，从1931年的嫩江江桥抗战、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察哈尔同盟军抗战、十九路军福建反蒋抗日事变、1936年的绥远抗战，到1937年后发生的卢沟桥抗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以及长沙会战、枣宜会战，甚至对中国远征军的出国缅甸作战、国民政府收回“台湾”等重要内容，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与此同时，中小学教科书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不仅图文并茂，而且对国民党军队抗战活动的描写，比高校教材还要具体生动。

这种设置，在今天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科书中仍然得到了保留和强调。该教科书（2009年版为例）按照时间顺序，仅用整段篇幅直接叙述1937年以后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活动的文字，就有13个自然段，并且对正面战场的主要会战都作了一定描述，绝非是一笔带过。其中既充分肯定了国



民党军队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抗战活动,也适当提及了国民政府消极抗战的一些作法。而对于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的描述,该教科书只使用了9个自然段。

此外,对在抗战中为民族捐躯的国民党军队爱国将士,这本大陆的官方教科书也有不少详细描写。例如,对抗战之初在北平阵亡的佟麟阁、赵登禹将军,对战场殉国职务最高的张自忠将军,对出国作战殉国的戴安澜将军,都具体说明了他们的职务、牺牲的战事、地点和时间。而对于共产党方面抗战牺牲的将领,教科书提到了左权、杨靖宇、赵尚志、彭雪枫四位,除了说明他们牺牲时的职务外,其他内容则只用了“先后在作战中以身殉国”^①一句话,就一笔带过。

抗日战争是在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进行的,是中华民族团结御侮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生存而进行的一场血肉抗争。大陆教科书介绍这场全民族战争的写法,可以说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显然,大陆方面并没有贬低、抹杀当年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军队爱国将士的功绩,也没有将抗日战争的所有历史功绩全都记在共产党自己的头上。令人遗憾的是,台湾地区的教科书一直就没有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功绩写进去过。对于此等历史恩怨造成的惯性心结,大陆方面一直没有计较过;但是对于前些年台湾教科书中出现的一些“台独”倾向,我们却是毫不容忍的。什么叫做以民族大义为重呀?孰是孰非,明眼人自有公论。

其实,中共领导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历来是一贯的。对蒋介石政府及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及其以后,始终都强调得非常清楚:认为蒋介石政府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不管怎样,毛泽东都实事求是地把“抗战”二字给了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只不过在如何抗战的方式上,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

在这段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即大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40周年、50周年、60周年等重大纪念日都举行了各种活动——不仅发表社论和评论,出版大量著作和文章,拍摄《血战台儿庄》、《南京大屠杀》、《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大批著名影视作品,而且几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都在盛大集会上发表过重要讲话,对国民党政府及军队的抗战功绩,明确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可惜的是,台湾地区历任领导人却没有对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公开给予过类似的肯定。

笔者因此就纳了闷了:某些总说“共产党一直不宣传、不承认国民党抗日功

^①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53



绩”的人，该不是在哪些地方出问题了？——是从来没有上过学，因而无知？或者在读书期间听不懂或根本没有听老师的讲课？当然，也有可能是凭着感觉扯几句或者借着谈时髦话题来自我炒作。总之，笔者不希望有些人是出于无良。

新时期的大陆官方和学者，为了促进祖国统一，从正面抓住了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努力进行抗战的历史活动主流，并没有过多批评其制造“反共摩擦”的倒行逆施，也不再过多地谴责重庆政府某些要人与日本侵略军、汪伪卖国集团暗中谈判勾结的劣迹丑行。其实，国民党政府这些非主流性的错误，很容易被人们举出来一些。我们主张和而不同，强调的是全民族团结御侮并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一面，并没有兴趣总去小肚鸡肠地纠缠这些历史恩怨的旧账。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大陆，过分强调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功绩，却变成了一件很时髦的事情。虽说现在人们的言论自由，但总不至于自由到了随意戏弄历史、无端颠倒是非的地步吧？

其实，过高的评价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真没有必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作为一个当时在中国拥有最多党员（1937年为165万名党员，1945年达到806万名党员），拥有包括陆海空军在内的强大正规军（1937年为170余万军队，1945年达到440万正规军），拥有全中国的国土人口资源、财政税收资源、工矿交通资源、外交外援外贸资源的执政党，与其在这场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毫不相称。甚至有一个时期，有的国民党将领整天考虑的是如何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来抵抗日本侵略——今天制造黄河花园口炸堤漫水事件、明天自己又纵火焚烧长沙城，在风声鹤唳中搞出了一系列不顾百姓死活、自摆乌龙的所谓“焦土抗战”闹剧。这纯粹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最无能笑谈，是一个现代国家政府军的耻辱！这种顶风都臭千里的所作所为，我们怎么能够过高地评价呢？它确实使我们很难对其多恭维一两句。对于这些史实，我们在教科书中其实都尽量回避了。

有的人认为，国民党到底抗不抗战，皆取决于共产党是否对其实事求是地宣传。这种逻辑就更有些莫名其妙了。在这里，我们先引用蒋介石先生当年的讲话。他在1944年2月10日于衡山召开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的《开会训词》中说：国军“以二十个军来对付敌人一个军，还打不过敌人，还要常常受敌人的打击。这样一比，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能力、人格、地位，真不知低落到何等地步”？蒋介石在这次训话中还说：“盟邦人士表面上赞许我们，说我们军队英勇善战，其实人家愈赞许，我们愈觉惭愧！”国民党军队如何抗日，其统帅心里是很清楚的。大陆如果再大张旗鼓地、实事求是地对那些败迹大加宣传，蒋先生就不仅仅是“愈觉惭愧”的问题了。其实，我们不想多宣传，因为总归是咱中国人自己的家丑，不说的原因之一是要比他们更感到羞耻。



国民党著名的官方史学家张秉钧在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一书中,对此做出过解释,他在书中说:“我总统蒋公,高瞻远瞩,洞悉世局,认识共匪乃最危险之敌人,亦自由世界之公敌。对于日本军阀之狂妄暴行,则曲予容忍,即在战后犹惠然以德报怨”。国民党是否“消极抗战”,已经是不打自招了。这位学者甚至还颀颜说,那是国民党“国家战略上卓越之决策”。我们可以看看这位蒋总统的作法:对日本法西斯的“狂妄暴行”,他不仅能够“曲予容忍”,而且后来更是“惠然以德报怨”,俨然一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人大量。但是,他却把注意力全都“洞悉”于“共匪”这个“最危险之敌人”,甚至干出了围攻新四军的卑鄙勾当。对这种大敌当前、不顾民族利益而“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行为,我们将其概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难道有哪一点不准确吗?

我们说,国民党军队爱国官兵英勇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功绩也是伟大的。在全面抗战八年里,国民党方面称有 206 名将领为此亡故。大陆方面从 1985 年开始,对其中 115 位在战场上牺牲、殉国的国民党军队少将以上的将领(包括死后追授晋升者)给予了肯定和褒扬,其中授上将衔者 8 人、中将 42 人,少将 65 人。比如 1938 年 3 月国民党军队死守山东滕县城的一仗,守城的川军师长王铭章及赵渭滨、邹绍孟三位将军在城破后的巷战中先后英勇殉国,他们的事迹在改革开放后就得到了大力赞颂。当然,我们对有些事件的研究和宣传显得还不够,包括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为收回台湾所做的努力,也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其实这也很正常,因为史学研究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不可能任何问题都一蹴而就。

我们歌颂所有为了中华民族解放而英勇殉国的英烈,包括国民党方面在战场殉国的 100 多位将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又有谁在探究:抗战期间究竟有多少国民党军将领率部投敌呢?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他 1986 年主编的权威性著作《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举出了这样一组数据:抗战时,国民党军仅在“1941 年有 12 名将军投降;1942 年 15 名,1943 年最多,达 42 名。有 50 多万军队被投降将军带走,而日本则用这些傀儡军队,在占领区对抗共产党游击队”^①,其实他说的还只是这三年的情况。此外,台湾学者李敖和费正清教授,都对国民党军抗战八年的杀敌数字进行过统计,他们认为是在 44~45 万日军之间;而日本厚生省 1964 年公布的统计数字认为,有 43.56 万侵华日军死在中国战场。就算这些日军都是被国民党军队消灭的,那么一个怪命题就出现了,即:抗战八年,国民党投降的将军比战死疆场的将军多,国军投敌的人数比杀敌的人数多。

这又怎么解释呢?这种结论该不是大陆方面所为吧?当然,大陆现在谈抗战

^① [美]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623





问题,主要还是从全民族团结御侮的角度来讲国民党当年在抗日战争中的主流性活动。

为了将这一命题证伪,笔者顺手写了上述几句,目的是想说明,历史知识在中国的普及是一件好事,但历史结论又绝非是一个可以由人任意拿捏揉玩的泥娃娃。

最近一个时期,史学研究似乎掉进了一个以翻案为时髦的怀疑主义漩涡之中,以往所有的历史结论好像都要被“翻个身、砍两刀”。其实,这已经不叫研究,也不是爱好,而是对我们过去一些“极左”错误认识的过度惩罚和戏谑性报复。笔者只想说,任何极端性的看法、情绪化的发泄,都与科学认识相去甚远。要知道,无论做哪一门学问都必须老老实实,要理顺继承与批判的关系,而来不得任何虚无主义的噱头和恶意炒作。

笔者以为,对历史感兴趣的青年学子,首先要练好史学考证的基本功。因为考证是思辨的基础,思辨是考证的理性总结;考证是新认识的发端,而思辨最终导致旧认识终结。因此,信史皆以考证为先,这样才能使思辨放射异彩。此外,还要注意从小题目做起,而不能专挑自己还没搞明白的大课题开聊。在史学研究中,要注意学会寻找用于论述的证据,辨别史料价值的大小和真伪,理清时间、空间的逻辑线索,核实人与事之间的确切联系等。只有从基本史实出发进行分析,我们才能得出准确的研究结论。要知道,任何一个小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容易的。在社会风气极为浮躁的今天,对待科学的态度更需要如此。这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

中国是一个历史资源丰富的文明大国。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典故和历史常识,处处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历史遗迹在时时陪伴着我们,历史积弊也时时困扰着我们,历史机遇则时时激励着我们。人们每天生活在历史之中,每天又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创造着历史。我们的古人曾说,“欲行大道,必先修史”。没有人类历史的长期积淀,没有人类对历史的正确解读与反思,就没有今天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与繁盛。因此,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就像尊重我们自己一样。

中国近现代所涉及的历史虽然只有 170 年,但它横跨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三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深刻、最激烈、最重要、最频繁的变化。它线索繁乱,史实庞杂,内容丰富。笔者以为,一个时期的历史记载越丰富,说明这个时期发生的重大事情越多,同时意味着人们在这一时期所经受的痛苦和磨难也越多,因而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加以总结。

笔者写作本书的目的,是想与广大青年史学爱好者、尤其是各级干部和知识

分子一起思考,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搞清中国近现代历史究竟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笔者通过自己30年的学习研究,在对比和总结中发现: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年历史,完整记录了中华民族由屈辱落后走向伟大复兴的崛起进程。当代中国的崛起,是十几亿人的共同崛起,而当年英法的崛起只在千万人的层面,美日的崛起则是上亿人左右的级别。可见中国崛起的难度和影响,显然超过了英法、美日等国的十倍乃至百倍。在这一崛起过程中,引领和推动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内在驱动力,恰恰是我们学习和思考这段历史的关键所在。透过17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各种表象,我们可以得出四个规律性的结论,即:中国的文化底蕴有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有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途无量。总之一句话,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有种!可惜的是,我们有些人现在享受着这种深刻变革所带来的成果,但说起这种话来却又有一些底气不足的感觉。由此可见,自觉地从历史昭示中启迪智慧、汲取力量就显得十分重要。

拉杂至此,姑且以其代为《序言》。本书写作,参考了一些专家与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个别地方未能一一加以注明。此外,书中不尽如人意之处,笔者持论不当之语,务祈各位阅正、指教为是。

大连工业大学 赵振国

2010年岁末 于大连 泽龙湖畔 浅溪堂寓所

曾国藩及其历史评价

晚清重臣曾国藩生活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接踵发生，腐朽的清王朝被卷入了西方列强掀起的殖民扩张和掠夺大潮之中。在曾国藩等人努力下，日趋衰微的晚清统治一度出现了所谓“中兴”局面。位兼将相的曾国藩，是咸丰、同治年间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汉人高官。

自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而官居极品以后，伴随中国社会 150 年间的迅速变迁，人们对他在晚清政治中所起作用的争议此伏彼起；毁誉褒贬之声各执一词，始终不绝于耳。或尊其为“中兴第一名臣”，或呼其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或称他是“洋务运动的先驱”，或斥其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或曰“妥协媚外的汉奸卖国贼”，或曰与孔子、朱熹齐名的天下儒学精神偶像，可谓“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尤其近些年来，曾国藩在中国的影响突然飙升，有关他的出版物无论是“家书”、“文集”，还是“画本”、“评传”，在书市、书摊、书店里到处充斥，其印行量已经到了无人匹敌的地步。显然，曾国藩这位声名显赫但又极具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曾国藩“修齐治平”的仕途经历

曾国藩，晚清大吏，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清代“湘乡派”散文的创始人。

曾国藩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811 年到 1838 年，作为南方偏远山乡有抱负的富家子弟，曾国藩发愤苦读，27 岁就成功完成了他的科考之路。第二阶段为 1838 年到 1852 年，曾国藩的角色转变为京城中的太平京官。其官职十年七迁，可称少年得志，官运亨通。第三阶段是 1852 年到 1864 年，曾国藩从在家乡组织湘军入手，由一介文官骤变为与太平军作战的清军统帅，后因镇压农民起义而战功显赫。第四阶段从 1864 年直到 1872 年去世，此时的曾国藩因战功封一等毅勇侯，官居武英殿大学士，先后担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

曾国藩的一生，兼刽子手与道学家二任于一身。他活动的政治前提，就是全力维护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秩序。围绕这一目的，他要守旧，着眼于恢复中华文化的固有传统；同时，他又要革新，表现在敢于接受一部分近代欧美先进文化。

家世与读书生涯 1811 年（清嘉庆十六年）11 月 26 日，曾国藩生于湖南长沙

府湘乡县井字镇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一个豪门地主家庭。他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死后封公,追谥“文正”。

曾国藩兄妹九人,其居长。祖辈以务农为生,家境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文化不多,但阅历丰富,经常教育子孙辈:“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认为“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企盼后代建功立业的心情溢于言表。其父曾麟书,以塾师为业。曾国藩作为家中的长子长孙,自然得到长辈的悉心爱抚和严格训励。

曾国藩的天资并非十分聪明,由于自幼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使其深悟人生苦读、发奋图强的道理。他6岁入塾启蒙,8岁随父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即读《周礼》、《史记》及《昭明太子文选》,16岁在长沙参加当地童子试,名列第七。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22岁的曾国藩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次年中举人。其间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

此后,曾国藩两次参加会试均未及第;后经努力复读,在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殿试时被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被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继续学习。是年,曾国藩27岁。

极为顺畅的京官仕途 曾国藩入馆后,仍然对学习孜孜不倦,尤其标榜“日以读书为业”,日夜苦读不息。1840年5月,庶吉士散馆,曾国藩授翰林院检讨。入仕后,他即拜在主考官、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门下。

曾国藩当官之初,即逢鸦片战争爆发。他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英夷……不知何日恶贯满盈,始得聚而歼灭!”^①此时,曾国藩追随主和派,视“抚夷为上策”,将朝廷对英谈判视为“以大事小”;《南京条约》签订后,他称其为“安民而息兵”的“乐天之道”^②,因而赢得力主“和戎之策”的穆彰阿赏识。从此,曾国藩的为官之路一步一阶,极为顺畅,累迁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稽查中书科事务等官职。

其间,曾国藩与大学士倭仁一起,于1841年8月拜道学名家唐鉴为师,随其学习程朱理学。不久,任国史馆协修。他博览历史,勤于求教,重视理学,不耻下问。此外,曾国藩还阅读了大量古典诗词散文,可称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在有清一代的官员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在少见。曾国藩由此得到了皇帝与同僚的青睐,得以平步青云。1847年7月,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成为清代出任二

① (清)李瀚章,李鸿章编校:《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二日二十四日。上海传忠书局1879年刻印本。

② 曾文正公全集·第四册。《家书》卷一。东方书局,1935年铅印版:15-16

品官职者中最年轻的汉人。

年少的咸丰帝即位后,对当权日久的权臣穆彰阿甚为不满。曾国藩察觉后遂在1850年春上疏,不指名地抨击穆彰阿用人不当,以致行政混乱。不久,咸丰帝借机下令,将穆彰阿革职。后世史学家范文澜评论此事时,认为“曾国藩学得道学的虚伪,却不曾受束缚于道学的迂腐”^①,可谓一针见血。穆彰阿下台后,曾国藩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以礼部右侍郎衔,先后署理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直至母丧,丁忧回籍。

曾国藩在京为官14载,其官职10年七迁,步步擢升,连跃十级,直至正二品衔。他在官场升迁如此之快,关键在于既能刻苦修身,又会审时度势、见风使舵。曾国藩感念满清皇室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为巩固大清社稷竭心尽智。

统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反清起义 1852年,曾国藩因丧母丁忧,回乡守丧。此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开始席卷南方,尽管清政府从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和绿营兵来对付太平军,但武备松弛的清军已经不堪一击。为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各地在乡官绅举办团练的上谕,企图利用沿途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农民起义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湘军武装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1853年1月(咸丰三年),经好友郭嵩焘的反复劝说,曾国藩到长沙奉旨,帮办湖南团练,9月奏准至衡州练兵。曾国藩依靠同族、同乡、师徒、同窗、密友等传统的人际关系,招山民为营勇,任儒生为将佐,在湘西一带建立了一支结构紧密、人身依附关系极强的地方团练武装——湘勇(通称湘军)。起兵之初,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他站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的角度,攻击太平天国“荼毒生灵”,号召天下“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因而得以广揽人才,鼓动更多的知识分子和乡绅豪强参与抵御太平军的作战。

1854年2月,由曾国藩精心操练的1.7万名湘军从湘潭倾巢出动,迎击太平天国的西征军。自诩战无不胜的湘军,出师不利,初战即败于靖港,羞愧难当的曾国藩险些自杀。随后,湘军开始在岳阳、武汉接连获胜。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九江遭遇石达开率20万太平军主力与之对抗。湖口恶战,湘军水师主力被石达开部歼灭,曾国藩再次陷入险境,只得困守南昌。曾国藩审看由幕僚起草的检讨已过的奏章时,以一句“屡败屡战”的改动,向咸丰帝表达了自己对抗太平军的顽强意志。直到湘军攻占安庆、九江后,曾国藩才真正扭转了战场上的被动态势。满清皇室对手握重兵的汉族将吏,始终心存疑虑。由于江南、江北大营接连被太平军击溃,清政府只得于1860年8月授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四

① 范文澜.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68

省军务。曾国藩成为康熙朝以来 200 年间第一位统御重兵的汉人总督。

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湘军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正规常备军。曾国藩治军的特点,在于用封建伦理教育来驯化湘军官兵的思想,并采用获胜后可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等办法鼓舞官兵士气,因此养成了湘军凶悍残暴的本性。曾国藩极力反对“借洋兵助剿”,但为提高湘军的战斗力,却在军中组建了中国最早使用近代火器作战的洋枪队,并于 1861 年建立安庆内军械所,聘用西方技师,征招士兵做工匠,专事修理枪炮、制造火药和子弹。湘军因此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军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对太平军作战的主力,并由此立下了显赫战功。

曾国藩将屠杀起义军视为“大仁”,对被俘官兵所采用的手段极为残忍。他不仅自己杀人如麻,其四弟曾国荃更是著名的杀人魔王,且因杀人过多而获“曾剃头”的恶名。曾国藩所部对被俘获的太平军将士用刑酷烈,杀人根本不依据任何律条,也不需任何审批程序,“一概剃目凌迟”。据清代史书记载,曾国藩手下官员“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前后,为削弱太平军士兵的抵抗意志,他先后亲自作《爱民歌》、《解散歌》,并教人在军内外广为传唱,告诫手下“勿扰民”以及实行“匪类胁从皆获免”政策的道理^①,曾国藩此举,对于瓦解太平军后期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曾国藩指挥下,湘军曾国荃等部围困南京将近两年,最终于 1864 年 7 月用炮轰和掘地爆破城防的方式攻陷南京城,先后擒获太平天国的幼天王以及洪仁玕、李秀成等主要头领,且城中军民被杀十余万众,“秦淮长河,尸首如麻”^②,火光三日三夜未息。曾国藩因“剿灭发逆”有功,被清王朝封为一等勇毅侯、加太子太保衔,成为有清一代以文人而封为武侯的第一人。

晚年的“剿捻”与处理“天津教案” 太平天国失败后,散落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使反清浪潮再起。1865 年 6 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随即率湘军 2 万、淮军 6 万,携洋枪洋炮北上“剿捻”。其间,他委派容闳去美国,购买办兵工厂所需各种机械,并在 10 月与李鸿章一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

曾国藩深知自己手握重兵、功高震主,遂无意再立大功,于是提出“重点设防”的计划,要求各地坚壁清野、修圩掘壕,只以马队追踪,力求把捻军围困在淮河、运河、沙河、贾鲁河之间的地区,使其无处可逃。曾国藩“重迎剿不重尾追”的消极防御方针,导致捻军寻机在开封以南的芦花冈一带冲破清军的堤墙防线,并在 1866

① [清]李元度. 国朝先正事略. 下册. 卷二十六. 长沙:岳麓书社,1991:797

② 曾文正公全集. 第四册.《家书》卷一. 东方书局,1935 年铅印版:165



年9月进入山东境内。曾国藩趁机上奏自责，借口年老体衰，自请交出了湘军的全部兵权，并力荐李鸿章率淮军接替自己继续“剿捻”。曾国藩在权倾朝野之时，急流勇退，于当年12月回任两江总督，仍继续影响清廷朝政。

1870年（清同治九年）7月，已调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办理“天津教案”。此案起于当年6月，天津城内多次发生拐卖儿童案件，民众怀疑法国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名，虐杀婴儿，遂引发群情激愤。21日，天津地方官携带所捕获的拐骗幼童疑犯，前往“望海楼天主堂”门前对证。近万名群众围观论理，要求严惩罪犯。在场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遂到北洋通商大臣衙门进行辱骂并开枪恫吓。之后，丰大业路遇天津知县刘杰，二人在街头发生争执时，丰大业开枪射杀了县衙随从高升。在场民众由此被激怒，在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后，又鸣锣聚众，冲进教堂杀死10名修女、2名神父。此外，还有4名法国领事馆人员及侨民、3名俄国侨民及30多名中国信徒死于这一事件；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英美传教士在天津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也在事件中被焚毁。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7国联合对清政府提出抗议，法英两国军舰也开到天津口外进行军事恫吓。

曾国藩抵达天津后，既派员四出缉捕嫌犯，也注意打探事态的发展。他惟恐引起与法国开战，于是采取“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一当否”的方针。经过与法方商议，最终决定：杀掉20名捉到的中国人犯（再加上被枪杀的高升，中国人也死亡21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等25名官员革职，充军流放黑龙江；支付46万两白银，以赔偿外国的各种损失；由北洋通商大臣崇厚率团，赴法国赔礼道歉。对这一交涉结果，朝廷中一些臣僚及民间舆论极为不满。曾国藩在湖广会馆悬挂的匾额，也被湖南同乡砸烂焚毁。曾国藩自己也深感“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压力。

在天津教案的交涉过程中，曾国藩与担任翻译的容闳逐渐熟悉。1871年夏，曾国藩接受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一起上奏清廷，提出了“选派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的计划，并制定出《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选派中国幼童赴美国留学，是曾国藩一生所办的最后一件大事。

1872年3月1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为清王朝拼杀半生的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猝然病逝。清廷加赠其太傅衔，追尊“文正公”谥号。其子曾纪泽、孙曾广铨，皆为清末外交界高官，有功于国。当年曾国藩的幕府门生云集，晚清名臣如李鸿章、左宗棠、薛福成等，均拜其为师。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以《曾文正公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二、全面梳理曾国藩的庞杂思想

曾国藩一生经历了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过程,这为他“立德、立功、立言”成为所谓“三不朽”的典型,提供了历史际遇。他早年专精传统的国学伦理,历练学识修养,苦心学做圣贤;后期从戎统兵,兼理朝政,显示了丰富的封建政治经验。曾国藩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这是我们研究和评价他的一个基本平台。

(一)以理学为基础、易学为指导的思想理念

笃信以“礼”为核心的理学观念 作为思想家,曾国藩以程朱理学为基础,从中提炼出自己的“治政、治兵、治家、治学”之道,并贯穿于他的“修齐治平”政治实践。这是曾国藩不同于他人的一个特点。

曾国藩崇信程朱理学有一个过程。1841年夏,儒学文化功底已经很深的曾国藩,在京拜著名道学家唐鉴为师。他当时向唐鉴请教“检身之要”与“读书之法”,唐鉴回答他:“当以《朱子全书》为宗”。从此,曾国藩潜心研究程朱理学,不仅认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义理之学最大”,而且极为重视所谓的“经济之学”,即古代的“礼学”。曾国藩的崇礼,不仅基于其娴熟的政治经验和丰富的历代掌故,而且也来自他所推崇、效仿的同门学友倭仁“见过自讼”的做法。因此,曾国藩在修习中感悟到:以礼学为基础的程朱理学,才是更为系统的孔孟之道。这也是曾国藩醉心运用理学的道德标准,进行自己“完人”修炼的原因。

曾国藩极为尊崇“三纲五常”的理念,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因此,他处处以此自律,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楷模。例如,1854年夏曾国藩再整湘军后,接连攻下岳州、夺取武昌,咸丰帝接到捷报后,下旨以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由于对其不放心,7天后咸丰帝又收回成命,改赏曾国藩兼兵部侍郎衔。这一职务,曾国藩早在5年前即已担任过,但他毫无怨言,依旧竭尽全力地对抗太平军。这就是曾国藩自觉维护和服从封建秩序而采取的“以礼自治”的处事之法。

正因为笃信理学,曾国藩的政治活动处处充满了伦理说教。在湘军起兵时发布的《讨粤匪檄》文中,他站在封建道德的制高点上,攻击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荼毒生灵”;认为传播异域邪教“作乱”,是要将“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①。当近代历史假曾国藩之手,对南京、北京这两个对立政权的生死存

^① 曾文正公全集·第二册,《文集》卷三,东方书局,1935年铅印版,49-50

废进行宣判时，主导曾国藩选择的发力点，恰恰来自他对“开辟以来名教”的重视和信仰。

有些人基于这些因素，对曾国藩给予了极高评价。辛亥革命时，身为立宪派的梁启超为了抵制孙中山学说的传播，就提出曾国藩“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比肩者”，甚至将他视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近代还有学者把曾国藩与孔子、朱熹的儒学成就并列，认为：孔子集夏、商、周三代儒学之大成，朱熹集秦汉、唐宋儒学之大成，曾国藩集宋元、明清儒学之大成。这些持论，言过其实，不过是想在封建社会终结之际打造一座“千古第一完人”的传统精神偶像罢了。笔者以为，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什么完人；若说有，必定是骗人而已。

决定其行为举止的阴阳之道 曾国藩极为推崇《易经》中“一阴一阳为之道”的说法，以此作为指导他从政、为人和修身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这种理念注重阴阳的平衡与调和，也就是曾国藩在其家书中多次提到的“削息赢满”。笔者认为，阴阳之道是研究和破解曾国藩所有行为动因的一把关键钥匙。

所谓的阴、阳，是《易经》中主要使用的两个卦爻符号，古人以此来表示其视野中代表宇宙万物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现象，或者说它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生命变化的基本看法。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功名、事业、财富、地位、权势等一切好的东西，属于阳的范畴；而一切苦难、坎坷、贫穷、不利、退让、屈辱都归于阴的范畴；二者之间不能分离，而要互补、调和，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具体地说就是，当认为自己阳气过盛时，必须以阴气补之，反之亦然。例如，为了压抑自己，就要设法厚待别人。

曾国藩保持阴阳平衡的原则，主要包括执两用中，持盈保泰；韬光养晦，推功揽过；左右兼顾，刚柔相济；大功不举，急流勇退等传统的朴素辩证法概念。曾国藩很早就认为自己在“阳”的方面太多了，所以刻意将自己所缺的“阴”的方面增加一些；尤其在他晚年功高、官大之时，极为恐惧因自己阳刚太盛而招致陨灭，所以他处处退让和压抑自己，以保持所谓阴阳平衡。比如，曾国藩率部攻陷南京、剿灭太平天国后，清政府为他加官晋爵，朝野上下对他大加颂扬。曾国藩为缩小自己头上光环的亮度，于是立即上疏，将功劳归于朝廷、归于友军；自己不仅在当月就主动提出裁撤湘军 2.5 万人，而且其后十多天里闭门谢客；随后他又将总督行辕移驻安陵小镇。曾国藩将自己的功绩视为“阳”，认为过剩了就要溢出，就要招损，故以这种种“阴”的方法来衰减它。此即他所要避免的“阴阳失衡”的道理。

也正是基于这种阴阳平衡原则，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虽因杀人过多而得到“刽子手”称号，而他却笃信“行大恶则兴大善”的逻辑；他官居高位后，告诫自己